

16.04 28

歷史文獻資料

第八輯



淮 安 文 史 资 料

第 八 辑



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

主 编： 杭金荣
副 主 编： 马士年
责任编辑： 邵寄声
编 辑： 毛鼎来
朱慧君
郭寿龄

淮 安 文 史 资 料

第 八 辑

淮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淮 安 市 文 教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35千字 开本1/32 印张6.375

1990年10月印刷 印数0001—2500

苏淮出准字(90) 43 号 工本费：2.40元

目 录

周恩来在南开的体育活动片断·····	王淑静整理 (1)
周恩来、潘汉年与周作民的交往·····	朱时雨 (5)
南汉宸谈周作民·····	闵一民 (8)
周作民对发展民族工业的贡献·····	徐国懋 (11)
淮安的倭患和沈坤的抗倭斗争·····	蔡铁鹰 (17)
左宝贵与淮安·····	王汉义 (27)
爱国人士陈亦侯胡仲文护藏国宝纪实 ·····	彭 莱 刘书中 (33)
附：中国银行负责人在胡仲文先生追悼会上致 的悼词	
我国早期体育专家郝更生·····	刘红伟整理 (42)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诗人段朝端·····	陈慎侗 (50)
“江北才子”毛元征·····	陈慎侗 郭寿龄(执笔) (63)
叔祖遯园公传略·····	罗继祖 (74)
郭大昌的治河事迹·····	朱方谷供稿 (79)
晚清水利专家殷自芳·····	王汉义 殷大彰 (85)
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罗福颐 (91)
“淮扬九仙”中的刘金方·····	田富生 (101)
刘树农教授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的建树 ·····	刘维松整理 (110)
高行素学术经验追记·····	高鸣珂 (120)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淮安的革命形势	孙芝瑶 (125)
解放后淮安第一次抗洪斗争的回忆	卢宝骧口述 朱慧君整理 (135)
淮城饮食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始末	徐志高 王震华 (139)
淮安刘鹗故居及其花园的示意图并解说	刘德馨 (149)
附：(1)《刘鹗淮安故居图》及其《图说》跋	季镇淮
(2)展阅《刘鹗淮安故居图》引起的回忆	黎民
(3)忆刘鹗故居兼及《老残游记》七绝八首	马济中
我所知道的战报	汪养吾口述 汪性颖整理 (167)
抗战时期民主政权创办的乡干训练班	张健整理 (173)
三官殿办学的风波	广渚 (178)
淮安县发行“流通券”的前前后后	王健夫 (183)
曹甸镇商会向县保安团捐赠棉衣裤的内幕	王健夫 (186)
韩德勤及其部属撤离淮安时的秘闻	王健夫 (189)
淮安震丰园馄饨	黄年辉 (193)
文楼蟹黄汤包	毛鼎来 (196)
第七辑勘误	(199)

周恩来在南开的体育活动片断

王淑静整理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四年（1913—1917），不仅读书勤奋，关心国家大事，而且很注重体育。他说，“国民教育”莫不以发达身体，陶养性格为第一要务，知识以启发尚次之，只有“健身体”，才能“根基固”①。

南开历来就非常重视体育教育。这个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校长张伯苓先生认为“德智体三育中我中国人最缺者为体育”②。

周恩来在校期间，充分利用校内宣传工具，热情宣传体育的重要性，由学生自己办的全校性刊物《校风》里，就经常看到他撰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他把注意体育，增强体质，同“增荣吾国”的志向相联系。对于体育动态，他几乎是一条不漏地给予报道，以引起全校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他报道体育新闻的范围、内容都很广泛，如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直至校内班组、宿舍的体育比赛。有一次，他用《华北大捷》③的醒目标题，报道了1916年5月南开学校在华北运动会上获“冠军锦旗”的情况，鼓舞人心。同时，他也撰文指出学校体育活动中的不足，他说：“我校运动各项，虽未臻盛境，然与他校比赛，

尚未尽落人后。惟铁弹、跳远、铁饼三项，屡遭失败，殊为我校运动之弱点。”鉴于此，有的老师“特捐银杯多只，以备奖励上三项之最优者”④。甚至将体育不及格的同学姓名刊登出来，既提醒他们注意，又鼓励他们奋起，说“前失可挽”⑤。对于学校之体育新规章、新措施，他均以《体育新章》、《考试体格》等注目标题，作详尽报道。他还以实例向同学们宣传体育锻炼的必要性，如他曾以《不幸夭亡》为题，报道了两位同学因为一味埋头读书而不注意身体健康，终以积劳成疾而致亡的消息。他无比悲痛地写道：“二君当年（青）勃发，学业日增之际，竟遭不幸。”他呼吁同学们：“我同学诸君痛悼之余，尚望时深警惕，注意体育。”“以二君为殷鉴，保千金之躯于永久。”还说，只有达到“发达体力，强健能敌一切传染不入身体，使永无疾病”，才能学有所获，学有成就。他多次提出学生在校学习的宗旨与责任是“读书、励行、健身”三个方面⑥。

周恩来克服了课外活动繁忙所带来的困难，保持了在东北小学读书时锻炼身体的习惯。他除坚持长跑运动外，还爱好网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田径运动。不仅平时和同学们一起锻炼而且积极参加比赛。他所在班（己三班）的体育活动分成“强”、“勇”两队，他是“勇”队篮、排球的主力，他的跳高成绩在一米六〇左右。据《校风》记载，他们班于1916年4月的一次多项比赛中，周恩来所在“勇”队排球获得冠军，他跳高获个人第三名。在参加宿舍与宿舍的比赛中，周恩来所在宿舍曾获田径优胜，得“我武威扬”奖旗一面。

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期对体育的重视，还体现在他所负责或组织的学生课外活动中。例如，由他领导的“敬业乐群

会”，就设有运动干事和专门负责篮球、足球活动的人员。1916年，他担任该会会长并负责童子部具体工作，体育开展更为活跃，童子部的篮球队经常参加校外比赛，有一队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课暇与周恩来商议球队进行方法”，“四月八日，童子部球队到高庄李氏小学比赛篮球，会长周翔宇（即周恩来）送到门前，祝吾等凯旋归”^⑦。童子部举行郊游，周恩来任总司令带领前往，组织泅水、军事游戏等活动。1917年，他就要毕业离校了，还组织了一次童子部体育运动会。每逢寒暑假，周恩来几乎都与留校同学一起度过，参与组织同学假期活动。1916年暑假，由学校组织了“暑假乐群会”，张伯苓校长任名誉（总）干事，公推周恩来为总干事，全面主持活动事宜。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这年暑假活动内容丰富多采，不仅有文娱、游戏、讲演、旅行等，而且每天都有固定的体育活动项目，如哑铃、棒球、武术的练习，球类、棋类的多项比赛，还排出名次，以示表彰^⑧。由于他的组织能力强，有一次学校让他带领足球队去北京与清华学校比赛，结果既增强了校际友谊，又获胜而归。

为了帮助学校解决一部分体育活动经费，校内的“新剧团”多次作募捐演出。周恩来是新剧团的创建者和主要成员之一，他扮演女主角，并任布景部副部长。1916年，新剧团的一次募捐演出活动，竟连演十天，每天一场，其中以周恩来主演的《一元钱》和他担任重要角色的《仇大娘》两剧占了八场^⑨。

周恩来在南开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使他增强了体魄，培养了进取精神，锻炼了坚强的意志。毕业后在留学日本和“五四”运动时期遭反动派逮捕的困境下，他仍然坚持体育锻

炼，这都为他以后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适应艰苦的生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解放后，已是全国人民总理的周恩来，回到母校视察时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个学校历来很重视体育，重视学生时期锻炼，这应该感谢母校，感谢母校的老师”^⑩。这句话，既说明了周恩来在时隔数十年之后依然不忘在南开求学期间的体育锻炼，也有力地说明了体育在南开教育中的重要位置。

注：

- ①《本社之责任观》（《校风》第66期）。
- ②《校长修身讲演录》（《校风》第30期）。
- ③《华北大捷》（《校风》第32期）。
- ④《特奖高悬》（《校风》第24期）。
- ⑤《修身班校长演说记略》（《校风》第92期）。
- ⑥《纪事·不幸夭亡》（《校风》第37期）。
- ⑦《峙之日记摘录》（《敬业》第5期）。
- ⑧《暑假乐群会始末》（《校风》第1、2期）。
- ⑨《体育之函请演剧》（《校风》第19期）。
- ⑩《南开教育论丛》第1期。

编者附注：

本文作者系天津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工作人员。

周恩来、潘汉年与周作民的交往

朱 时 雨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因在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期间遭到威胁而离沪赴港，函囑徐国懋负责金城银行总管理处和沪行的工作。不久，徐国懋也离沪去香港。这时，大陆各地金城银行向周作民发电申述经济困难，要求将金城的海外资金调回。

上海解放后不久，浦心雅（曾任交通银行协理）受黄炎培之托去香港，动员周作民等回大陆。以后，章士钊、黄绍竑受周恩来委托去香港，动员工商界知名人士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他们转达了周恩来的期望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使周作民、徐国懋等受到感召。这时，金城银行董事会在香港召开，认为在大陆各地的金城银行需要有人料理。周作民一再动员徐国懋先回上海主持内地金城工作，并表示他自己在可能情况下也要回沪。一九四九年秋，徐国懋转道津、京回上海。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徐国懋与章士钊联系。章即向周恩来报告徐回来的消息。翌日晚，周恩来约请徐国懋在中南海怀仁堂晤谈。一见而，周恩来便亲切地握着徐的手说：“徐先生，我们欢迎你。新中国非常需要金融家。”当谈到周作

民时，周恩来说：“对于周作民先生的情况，我是知道很多的，以前我们在重庆有过交往。”原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与一位名叫康乃如的很要好。抗战时，周恩来一度在重庆，常去康家。当时，周作民很想和周恩来见面。后来通过康乃如的牵线见了面。他俩都是淮安人，谈得很投机。周作民提出，他有个弟弟（名作屏，原住西长街邱家巷，后迁居上海一一编者）还在淮安，生活困难，因那边是解放区，无法汇钱过去，请求通过周恩来的帮助汇一些钱去。周恩来马上答应。

接着，周恩来对徐国懋说：银行界的先生们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欢迎他们早日回来。你回到上海后，如果碰到什么难处，可以去找副市长潘汉年、统战部副部长许晓新。我会通知他们给你一些照顾，帮助你解决一些困难。徐国懋将与周恩来晤谈的情况详细写信告诉周作民，使周深受感动。

徐国懋回上海后即拜访了潘汉年。潘欢迎徐回到上海，为繁荣上海金融事业作出贡献。并说，他已接到周恩来指示，对徐和金城银行加以照顾。还说：“我和你们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先生是老朋友，他为我们党和国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目前，周作民先生还留在香港，我希望他也能早日回到上海来。请你写信给他，转告我的意见，代我问候。”

潘汉年称周作民为老朋友，其中是有一段渊源的。解放前，潘汉年是中共香港地下组织负责人，当时周作民通过其他民主人士的介绍，和潘汉年结识。一九四八年底，北平和平解放，随后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决定定都北京，并积极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当时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响应

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准备前往华北解放区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找到周作民，问他能否协助这批人士北上。周作民表示可以由金城银行出资，在香港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担负起这个任务。为了使这件事得以具体落实，周作民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联系，共同协商，进行周密的安排。一九四九年二月末，金城银行花了约四五十万元的港币，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运送了一大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此后，周作民和潘汉年的关系更密切了。

周作民在周恩来、潘汉年和各方面人士的关心下，一九五〇年秋由香港经津、京返回上海。在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潘汉年还在上海设宴为周作民洗尘。

金城银行由于受解放前夕通货膨胀的影响，营业不振，月月亏损，实力大大削弱，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仍是赤字日增，周作民心急如焚，想将金城、中南两银行共同投资的一个纱厂出售，以填补缺额，便请求潘汉年帮助。潘汉年同意由政府买下并要周作民不必过虑，据实开价，还指示有关人员不能乘人之危压价，解决了金城银行的燃眉之急。

（摘自《统战工作史料选辑》⑥）

编者附注：

本文原载1987年1月16日《联合时报》，由周作民先生女公子芳远供稿；芳远老人现住南京。

南汉宸谈周作民

閔 一 凡

1958年初冬，我作为中国银行的一员参加了由南汉宸同志①率领的出席亚非国际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在经莫斯科、布拉格赴开罗的途中，一次偶然机会，南汉宸同志谈到了中国银行新董事会的情况，也谈到了周作民先生。

南老这次谈话是在途中候机室进餐和休息时谈到解放前夕旧金融界某些头面人物情况时说起的。当时在座的还有冀朝鼎同志（当时任中国贸促会副主席）、林震峰同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和杨旦华同志（现任外贸部第三局副局长）等。我当时向南老说起我于1935—1938年间曾在周作民的金城银行工作过一个时期，并谈到1950—1951年间我和项克方同志奉中国银行总行之命携带南老亲笔信件在香港拜访当时在港居住的宋汉章、陈光甫、张嘉璈、李铭（新中国成立后均担任过中国银行董事）及钱新之（交通银行董事）、周作民先生等情况。南老说，周作民的金城开始依靠北洋军阀交通系起家，后来又和国民党政学系关系密切，在此期间，他把金城的力量壮大发展了。周早年留学日本，在抗战沦陷期间，周作民和日本人的关系也较密切，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民族金融资本家的两面性。但是，全国解放以后，从国

内跑到香港和国外的一些金融界头面人物包括贝祖贻、宋汉章、陈光甫、李馥荪、张嘉璈等，我们虽然多次邀请他们回国，参加中国银行董事会并协商其它事项，可是真正回来的却只有周作民一人。周回国后，还积极响应和推动私营银钱业向公私合营发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周建议把公私合营银行总处由上海迁到了北京，他还向国家捐献了个人的外汇财产和珍藏的文物、图书，接受并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担任了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②。从周作民和金城银行全部历史看，金城应该是民族资本银行，周作民是一位爱国人士，可惜他在前几年就去世了^③。

南老还说中国民族资本银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人民银行金融系统组成的一部分，好比百川汇大海一样，人民银行整个金融体系就如浩瀚的江海，而众多的民族资本银钱业包括其它各种经济成份的金融机构，则如涓涓细流汇注到大海中来，这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发展的产物。南老这一句“涓涓归江海”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怀。

注：

①南汉宸同志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任行长，也是中国银行解放后第一任董事长。

②1952年12月成立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共有六十余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组成。联合董事会的组成是：董事长 胡景翼，副董事长 陈 穆、周作民、谢寿天、项叔翔、王志莘。

③周作民在公私合营银行改组完成后，常在上海居住，‘三反’‘五反’时，他受到周总理保护。1955年3月8日，因心脏病逝世，终年71岁。1987年8月，上海市政协在万国公墓举行了周作民先生新墓落成仪式。

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计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摘自李先念同志1989年8月17日《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周作民对发展民族工业的贡献

徐 国 懋

毛主席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历程时曾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这四位实业界人士中，范旭东创办永利化学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两位事业的成功，金城银行周作民是帮了很大的忙的。金城对这两个民族资本企业，不但经常给予巨额贷款，而且还直接投资。据统计，金城银行对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实业公司的投资，分别占这两大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九点七三和百分之十六点六六，可见彼此关系非同一般。我在周作民手下工作十多年，对他怎样在范旭东和卢作孚两位事业上遇到最困难时期，给予大力协助，有些了解，现就我记忆所及，谈谈周作民对民族工业发展所作的贡献。

周作民是淮安人，他不仅是淮安的一位杰出人才，也是旧中国一位有抱负、有魄力、有实绩的民族金融家。他的一生，对我国金融事业有很多建树。现在我想讲一讲他给我印象最深，也是使我最钦佩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资助范旭东先生创办永利化学公司。

范旭东是旧中国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整奋斗了三十年，为创立我国的化学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4年，年青的范旭东从日本学成归国，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久大盐业公司，只用了两年多时间，用海滩晒盐和卤水加工制造精盐获得成功，抵制了日本精盐在中国的倾销和垄断。接着，他又开始筹划创办制碱厂。酸、碱都属于基本化工，一向由国际财团垄断，用盐制碱的技术那时还极端保密。范旭东和他的老友侯德榜，齐心协力，刻苦钻研，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技术上经过千百次的试验与失败，终于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成功地制造出国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也赶上英国卜内门公司的“蛾眉”牌，不仅行销国内，并冲破国际垄断，打进日本和南洋的市场，使我国的民族工业扬眉吐气。

范旭东的制碱成功，周作民帮了很大的忙。如果不是金城银行的资金源源接济，不知要增加多少困难哩！1921年，范旭东在塘沽建立碱厂时，资本额不大，远远不能适应建厂需要，当时除了范旭东担任总经理的久大精盐公司给予有限的帮助外，主要靠周作民的支持。1921年后，他直接和金城银行开户，订立透支十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十五万元，1926年超过六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尤其对一个基础尚未巩固的企业来说，一家银行给予这样大的透支，确实冒着极大的风险。

为什么金城对永利肯做这样大的放款呢？这完全是周作民个人的远见卓识。当时天津金城银行同仁对如此大手大